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實務架構之探討： 從相關法制規範談起

李明政

壹、前言

一個運作熟練的專業，通常有賴具備該專業實務操作清晰好用的模型（model）或實務架構（practice framework）。社會工作的實務架構，是社會工作人員的工具或概念地圖，它是基於理論上可行的干預邏輯，所形成之一套可用來指導社會工作實踐行動的概念工具。（Connolly, M., 2007）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是國內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日漸受到專業夥伴重視的新興領域。假使，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也要朝專業化的方向前進，則也必須注重運用在該領域的實務架構。

依筆者之見，一個專業重要的實務操作原則及行動要素，往往會被制度化或法制化。換言之，在一專業相關的法令中，通常蘊含該專業的實務架構，只是周不周密或好不好用的差別而已。為檢視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實務架構，實可從相關法令

的內容分析著手。

當我們上網進入「全國法規資料庫」後，搜尋「社會工作」，可發現包含有規定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師的業務的法令，只有兩種，一是為建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體系，提升社會工作師專業地位，明定社會工作師權利義務，確保受服務對象之權益的國家法律「社會工作師法」，另一則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此外，還有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補助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聘僱用原住民社工員（師），辦理原住民社會福利服務工作而訂定之「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

本文，將上述三個法令中有關社工員（師）及其業務的規定，視之為一種實務架構，予以檢視，以期有助理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現實定位及其可能的發展。而

為便於敘述，以下將所擬檢視的內涵，基於社工師法規定的稱之為「社會工作共同實務架構」，基於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制定的法令，稱之為「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實務架構」，包括兩種，一為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規定的，稱之為「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另一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規定的，稱之為「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

貳、社會工作共同實務架構的檢視

一種較完整的實務架構，可能需要兼顧共同建構的知識、倫理與價值、理論、方法與技術、新的實務經驗學習等面向。

（Baron,S., Stanley,T., Colomina,C., and Pereira,T., 2019）共同建構的知識，涉及過去以來集體共構的歷史，新的實務經驗學習涉及朝向未來不斷延展出的新知識。在本文中，將僅著重倫理與價值、理論、方法與技術等面向的探討。亦即，就當前制度架構下，僅著重檢視有關社會工作介入的問題（或追求的目標）、介入的方法（技術或手段）、遵循的倫理（或實踐的價值）等重點的批判分析。

就現實體制而言，社工師法之規定可視為當前全體社會工作人員的共同實務架構，一方面因為社工員只要不使用社工師

的名稱，亦可執行其業務；另一方面更因為並不存在其他具替代性的社工共同參照架構。而就社工師法的內容看，與社會工作介入的問題（或追求的目標）、介入的方法（技術或手段）、遵循的倫理（或實踐的價值）等社工要素最為相關者，乃社工師法第二條以及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以下，就這些條文規定來代表我國社工的共同實務架構的內涵，並加以分析討論。

社工師法第二條規定：社會工作師，指依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術，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進、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的專業工作者。社會工作師以促進人民及社會福祉，協助人民滿足其基本人性需求，關注弱勢族群，實踐社會正義為使命。

社工師法第十二條規定社會工作師執行的業務，其第一項乃：行為、社會關係、婚姻、家庭、社會適應等問題之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根據上述社工師法規定的內容加以重構，大致可說指導我國社會工作人員的社工實務架構如下：

- （一）介入的問題，（或追求的目標）：
促進、發展或恢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的社會功能。
- （二）介入的方法（技術或手段）：主要
為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 （三）遵循的倫理（或實踐的價值）：實

踐社會正義。

社工師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之社會工作師執行的業務，包括各相關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保護性服務；對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之預防性及支持性服務；社會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與轉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於衛生、就業、教育、司法、國防等領域執行社會福利方案之設計、管理、研究發展、督導、評鑑與教育訓練等；以及人民社會福利權之倡導等，大致都可視為促進、發展或恢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的社會功能之相關手段，並與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互為表裡。在本文中，將它們予以簡化省略，以便把握重點來討論。

我國社會工作追求以促進、發展或恢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的社會功能，係參照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以下簡稱NASW）對社會工作所做的定義（Barker, R.L., 2003），如下述：

The NASW (1973) defines social work as “The professional activity of helping individuals, families, groups or communities enhance or restore their capacity for social functioning or creating societal conditions favorable to that goal.”

NASW採social functioning（即社會

功能）來做為社會工作定義的核心要素，實受Werner W. Boehm的影響，W. Boehm在1958年發表了〈社會工作的性質〉（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一文，首先使用social functioning一詞。其後，透過Harriet M. Bartlett的著作〈社會工作實務的共同基礎〉（The Common Bas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1970）的強烈肯定，social functioning乃成為NASW普遍共識的經典性的概念，標誌著社會工作干預的目標。

在W. Boehm於1958年提出social functioning作為社會工作干預目標之前，最主要的概念乃「人類共同需求」（common human needs）。它係Charlotte Towle的名著的書名，該書（Common Human Needs）最初係由美國聯邦安全署（the Federal Security Agency）於1945年發行，其後由NASW出版社多次再版。（NASW, 1965）

Charlotte Towle（1945）撰寫該書的背景，乃美國社會安全法確立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夥伴關係，共同提撥經費來從事公共救助，國家認定「免於匱乏的威脅」，乃是人類共同需求，公共救助係國家基於人權價值應有的積極作為。為了幫助從事公共救助的人員了解貧窮匱乏的成因及它對人類發展的重大負面影響後果，乃辦理公共救助訓練課程，C. Towle撰寫的Common Human Needs一書，即為該訓

練課程所製作的教材。(NASW, 1965) 依Helen H. Perlman於1965年版Common Human Needs一書的序中所述，該書不僅適用於公共救助領域，其內容實普遍適用於社會工作各個領域，該書已成為一部社會工作經典，而人類共同需求未獲滿足的情況，就是社會工作要介入的問題，滿足人類共同需求就是社會工作要追求的目標。

隨著現代社會變遷急遽，人類需求或社會需求趨於複雜化，1955年底美國若干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整合成立NASW後，「人類共同需求」作為社會工作共同的核心理念，也日益受到挑戰。W. Boehm 1958年發表的〈社會工作的性質〉，一開頭即指出社會工作專業實務的目標(aims and purposes)，在當時並不存在唯一的、普遍認知的或廣被接受的陳述；社會工作專業區別於其他專業的核心行動，仍欠缺權威性的論述。為了克服該困境，他深入探究社會工作專業存在的基本前提、根本價值，強調基於回應社會不斷變遷的需求，社會工作專業及其實施方式形成不斷發展的特徵，試圖重新把握社會工作的活動(activities)、功能(functions)和目標(goals)之特性。在其頗具說服力的論述中，他歸結社會工作的本質，提出social functioning一詞。他分析指出各種社會工作活動，都聚焦於關注人在社會關係中各種角色的履行，各種

社會角色的履行狀況不良，即社會工作者要介入或干預的問題，社會角色的履行狀況良好，社會角色的功能得以運作的狀況即social functioning。social functioning，是社會工作活動的本質，也是社會工作追求的目標。

W. Boehm (1958) 的社會功能論述，雖然一發表即獲高度肯定，但並非立即形成美國社會工作主流的共識。1970年出版的〈社會工作實務的共同基礎〉一書中，Harriet M. Bartlett循W. Boehm採取的社會角色理論觀點，她指出大多數社會工作者在陳述社會工作專業時，會強調兩大特質，一為社會工作是助人的專業，另一為社會工作從事的乃促成人之各種社會角色適應相關的活動。因此，她宣稱social functioning是社會工作處置所追求的目標或成果，social functioning可做為社會工作實務的共同基礎。加上，Florence Hollis (1972) 於其名著*Casework: a psychosocial therapy*中提議「心理暨社會」範式(即心裡暨社會診斷學派)要聚焦在「社會」的重點上，於是，social functioning就成了全美國在界定社會工作時的主流共識。(Blakely, Thomas J. and Dziadosz, Gregory M., 2007)

以F. Hollis為代表的心理暨社會診斷學派思想，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個案工作理論，該學派強調案主的核心問題，可歸結為案主自我決定能力的薄弱，而社工人

員最主要的角色職責，乃透過心理暨社會的診斷與處置，來促進案主自我決定的能力。F. Hollis對social functioning概念的接納，也意味著促進案主自我決定的能力的社工目標，可視同促進案主的社會功能。或者說，案主的社會功能失調，與案主自我決定能力薄弱，是一體的兩面。

我國社工師法中體現的社會工作目標和方法的內涵，大致就是1970年代美國社會工作的主流共識，就如Harriet M. Bartlett著作〈社會工作實務的共同基礎〉所要呈現的意涵一樣。而該社會工作的共同基礎，不論就理論或實務而言，都是基於強調民主平等的公民社會前提而成立的，也不容忽視。我國基於社工師法的社工架構，係參照美國模式，因此，強調社會正義價值的實踐，也就是同樣的道理。

抽象概括地說，社會正義是公民社會中人際互動最高的或最基本的倫理價值。公民社會的基本理念，強調每個社會成員都應同等受到尊重，各種制度都講究相關權利義務公平合理地安排或分配，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能民主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都能同等承擔或分享公民社會共同體的禍與福。各種權利義務的安排與分配，都循民主與平等的原則，承認每個個體之自我決定或自主的價值都同等重要，沒有任何個別成員可享特權，也沒有任何個體應被社會排除，這些原則都基於社會正義價值而成立。

我國歷經戒嚴解嚴，與美國社會的歷史際遇不同，美國社會和同屬西方文明的歐洲社會也有不同。雖然大家都同樣強調公民社會價值理念的重要性，都同樣強調社會正義。然而，彼此間實仍存在隱蔽的差異。

簡化地說，我國現行社工師法所參照之美國社會工作思想，對於現實政治經濟體制及大熔爐的主流文化價值較少挑戰，較關注落實讓人們或案主免於匱乏（貧窮威脅）和免於恐懼（暴力威脅）的實踐。而陷於貧窮與暴力威脅的案主，主要是在其直接的人際關係環境中所受的影響，社會工作者之社會正義價值的實踐，主要透過臨床社會工作，呈現在強調資源的公平分配，以及資源不足於同等分配時強調弱勢優先的分配正義上。

美國社會與我國有何不同？美國介入貧窮公共救助的人口比率，約占總人口的12%。（哈瑞爾·羅杰斯著，劉杰譯，2012）我國低收入戶人口比率則僅約占總人口的1.5%。美國運用社會工作的人力，雖無精確數據，但平均每位國民享有社工員的人數，相對於我國的情況，彼此應存在頗為明顯的差距。在運用社會資源介入國民或公民社會功能的預防、補救或發展課題上，相對有限資源及人力提供的前提上，有關案主社會功能失調問題，更易產生個體歸因，採心理暨社會診斷評估與處置，就更難有深度介入的可能。社

會工作者實踐社會正義價值，往往只能呈現在積極防範或矯正案主的福利依賴行為而已。

很少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方面的正義課題，是美國1980年代前的概況，我國社工師法參照的大致就是美國1980年代前的主流的社工專業架構，所以，迄今我國社工仍很少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方面的正義課題，仍以個案工作為主軸，社會正義價值的實踐，仍聚焦在防範及應對福利依賴之資源分配正義上。

基於社工師法之社會工作共同實務架構，社會工作專業在協助援助陷入貧窮或暴力威脅的原住民的作為，是否符合社會正義價值？該共同實務架構，是否也適用原住民族社會工作領域，實值得社工專業整體更多的關心與討論。

Ciwang Teyra (2016) 指出「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 已受到世界各國原住民族組織及學界的重視，歷史殖民壓迫對當代原住民族健康的影響甚鉅，歷史創傷會隨著原住民族面對當代的結構性與人際間的暴力、歧視而被強化或觸發。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2005)亦指出：

貧窮與匱乏是臺灣原住民普遍存在的問題，亦是原住民今日社會議題的核心。原住民因貧窮而缺乏自信，宿命，教育水準低落，健康不佳，平均壽命短，兒童營

養不良，住屋環境惡劣，酗酒、家庭不和與暴力。尤有甚者，因極度貧窮，原住民常有出賣女兒為娼、鋌而走險參與走私行竊，以及因負債與生活壓力自殺等悲劇。整體而論，貧窮阻礙了原住民個人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更被視為臺灣社會的負債與重擔。

種族歧視與偏見迄今持續蔓延。種族的歧視與偏見，造成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被諷為無能力追求進步者，是被同情、幫助者，亦使原住民失去對族群的自信，宿命。

上述Ciwang Teyra提出的理論觀點與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所描述的社會現實，扼要點出了基於社工師法之社會工作共同實務架構的盲點。

參、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的檢視

在我們的社會裡，如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所描述的，不同民族間滿足人類共同需求或社會功能之生活條件的差距（簡稱原漢生活差距），會不會隨時間之前進，而漸漸縮短以至消失？原漢生活差距與「歷史創傷」有關？原漢生活差距值不值得、應不應該由國家介入？縮短原漢生活差距與社會正義有何相關？接下來，讓我們先反觀當前基於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訂

定之法令的社工實務架構。

如前述，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可分為兩種，一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訂定，本文中稱之為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另一大致可說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訂定，本文中稱之為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

一、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的內涵

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依據的法令為「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適用於補助僱用原住民五十人以上之民營公司、合作社或其他依法設立之民間機構。對民間機構之補助，以補助社會工作人員一名之薪資為原則。民間機構運用的社會工作人員，則不必具原住民身分，但應優先僱用原住民或熟悉原住民族文化特性之人員。

「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係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七條規定來訂定，該條文內容為「民間機構僱用原住民五十人以上者，得置社會工作人員，提供職場諮商及生活輔導；其費用，由政府補助之。前項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從該條文的內容可知，其基本目標在協助已就業的原住民員工適應工作，或鼓勵民間企業僱用具原住民身分的受雇者。其運用的社會工作人員和所運用的社會工作方法，大致就是主流

社會共同的實務架構，只是僅限於運用在就業服務領域，針對已就業的原住民員工而已。

根據上述補助辦法規定的內容加以重構，大致可說指導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如下：

- (一) 介入的問題，（或追求的目標）：促進及協助原住民員工適應工作。
- (二) 介入的方法（技術或手段）：運用社會工作、職業輔導評量方法或就業諮商技巧。
- (三) 遵循的倫理（或實踐的價值）：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之實踐。

二、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的內涵

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依據的法令為「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主要目的在於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聘僱用原住民社工員（師），來辦理原住民社會福利服務工作。不同於上述民間機構雇用的社工員（師），依上開要點所聘僱用原住民社工員（師）必須具有原住民身分和族語能力證明書。

「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大致係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來訂定，該條文內容為：「政府應積極辦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事項，規劃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並特別保障原住民

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權益。政府對原住民參加社會保險或使用醫療及福利資源無力負擔者，得予補助。」根據該條文規定，原住民族委員會乃訂有「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計畫」，而「原住民社工員（師）工作要點」則依據該計畫訂定。

依郭俊巖、賴秦瑩（2019）的研究指出：當前臺灣原住民族無論在教育、就業、衛生或公共福利的資源與機會的取得方面，皆遠不如平地漢人。為了縮短原漢之間各項福利資源落差，原民會至今在全國總共設置63處原家中心為有福利需求的族人提供各項福利服務。

根據上開要點規定的內容加以重構，大致可說指導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如下：

- （一）介入的問題，（或追求的目標）：
原住民急難救助，原住民就業促進，原住民生命安全及相關權益的保護和促進（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案件之防治、通報與轉介、法律訴訟救助和原住民權益宣導）。
- （二）介入的方法（技術或手段）：運用個案、團體及社區發展等專業社會工作方法。
- （三）遵循的倫理（或實踐的價值）：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三、政府與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規範之比較與討論

從上開要點所形成之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與民間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不同，最重大的差別除了社工員（師）資格要求不同外，主要是介入的問題或追求的目標之範圍有別。一僅限於原住民已受雇員工的就業適應，另一則以原住民家庭為對象，補強其社會生活安全（或降低貧窮匱乏和暴力威脅的程度）或所謂落實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之政策。介入的問題、介入的方法和遵循的倫理，實無異於主流社會共同的實務架構。

政府機構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本質上雖無異於全體社會工作共同實務架構，然而，筆者認為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相較於全體社會工作共同實務架構，其表現出更為簡明的，更能反映實際指導社會工作行動的架構，尤其在介入的問題這個面向上而言，更是如此。

社會工作專業和所有的專業，都同樣旨在促進社會生活的美好，社會工作專業分工的定位，則在於協助弱勢者，讓弱勢者也能獲有美好生活的可能。隨著社會變遷，弱勢者也隨之有不同的內涵。筆者認為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在社會工作所擬介入的問題或所要追求的目標的表達上，相對更能幫助人們理解社會工作專業

的特性。

原住民族社工實務架構中要介入的問題或目標，可分三類：其一為「原住民急難救助」，其二為「原住民就業促進」，其三為「原住民生命安全及相關權益的保護和促進」。除了其對象限制在僅適用於原住民的條件外，其本質上與主流社會的實務架構實無差異。若就這三類介入的問題或目標，研判其預設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問題，來進一步說明其隱含的意義。這三類介入的問題或目標，實可視為不同社會環境前提下，不同類型的問題或目標。第一類對應前現代社會（農業社會時期），第二類對應現代社會強調自由競爭之市場經濟制度，第三類則對應現代社會強調民主平等之公民社會制度。

首先就「急難救助」的介入而言，社會工作專業迄今在臺灣仍經常被混淆為一般社會慈善公益團體，最主要就是「急難救助」的工作類型所導致。「急難救助」的活動，在前現代化的農業社會時期早已存在。農業社會時期，在生產力的侷限下，社會資源有限，往往只能救急不能救窮，必須強調錢要用在刀口上，有勞動力者要自食其力，只有值得同情者，才能給予救助。這個時期社會上的弱勢者，就是勞動能力欠缺陷入活困境而值得同情者。社會問題就是指社會上弱勢者生活陷於困境須運用社會力量加以改善的情況，長期性的生活困境給予長期性關懷照顧，短期

性者給予急難救助。我國政府的社會救助體系主要反應了長期性救助需求，非營利組織和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則主要協助介入短期性救助需求的部分。其思考邏輯和行動原則，大致與傳統慈善事業沒有明顯的差異。

其次，就「就業促進」的介入而言，現代社會的兩大特徵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工業化。現代社會經濟中，最重要的機制乃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現代社會中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制，被認為是最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也是分配最公平的制度，只要有工作能力的人都能積極參與勞動市場競爭，就能促成美好社會的實現。在這個環境前提下，弱勢者就是欠缺勞動市場競爭力者，社會問題關注的除了沒有工作能力者的照顧救助外，最主要的就是勞動競爭弱勢者欠缺工作動機或就業適應不良的問題，社會工作的目標，就建立在促進勞動競爭弱勢者的就業。就業適應者就呈現社會功能良好，就業適應不良，就是社工要介入的問題。

其三，就「生命安全及相關權益的保護和促進」的介入而言，其問題或目標最主要對應的就是現代公民社會制度。公民社會中的弱勢者，就是應享的權利容易被邊緣化或被侵犯的人，如兒童、身心障礙者、少數族群者等等。國家制定由社工來執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

等業務，大致可視為公民社會中弱勢者相關權利或權益的實踐與維護。公民社會著重權益義務合乎民主平等的安排分配已如前述，臺灣是世界上民主國家中曾實施政治戒嚴為時最長的國家，它與國內公民團體的社會參與情況不無關連，它與社會工作專業組織作為公民團體成員的公共參與也不無關連。或許是這樣的背景，我國社會工作者在維護公民權利的層次與認知，仍圍繞在生命權或基本的生存權上。當前我國這些攸關公民基本生存與發展權利的安排與維護，是否合乎社會正義價值的檢視，則仍在起步階段。基於多元文化族群相關的社會正義或基本生存發展權利的安排，仍處在混沌不明的狀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架構下，由於重要權益的實踐和維護都已由主流社會工作體系負責，原住民族社工只能負責模糊的原住民權益宣導，公民社會中的弱勢人口如身心障礙者、兒童及少年的權益都有法律做基礎，原住民或原住民族的權益則法律地位不明。因為，現實社工領域的社會正義價值實踐，往往只及於福利依賴管控相關的分配正義議題，幾乎少有涉及族群間制度性歧視的現況檢視或過往族群壓迫造成之後果的關懷，沒有族群間基本生存與發展權利安排或分配上的不正義被確認，原住民族社工就沒有明確的權利需要被轉化成服務方案來執行。

綜上述，筆者認為當前原住民族社工

實務架構，除了社工員和服務使用者族群身分資格上有所設限的差別外，其實務行動的邏輯與全體社工共同的實務架構則並無不同。

多年前筆者從事原住民族社會福利相關研究，從訪談經驗和文獻閱讀中，得出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要有別於以往的作為，就要奠基在多元文化公民社會的理念，及原住民族得享有文化福利權的概念上。這種權利內涵，呈上文脈絡而言，或可說就是要縮短原漢生活差距和終止歷史創傷的權利，歷史創傷導致原漢長期結構性生活差距，結構性的生活差距，又成為族群偏見歧視的溫床，而造成原住民族低度發展的相對貧窮困局。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社會正義價值，要奠基在國家承認原漢歷史創傷的結構，原住民族生活發展差距的問題，並不純屬個體社會生活適應不良或社會功能失調問題，國家有必要針對原住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予以正義的對待。若欠缺這樣的認知，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架構的發展，要超越只是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身分的差別，是不太可能的。

肆、結語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之所以推動，依筆者之見，大致與原漢間基本生活需求滿足情況，長期存在結構性的差距，受到原住

民族及友善者的重視密切相關。認為「原住民族在各種悲慘指數上都相對偏高，在各種文明發展指數上都相對偏低」是客觀現象，是自由市場競爭下的自然現象，並沒有人為的不公、沒有社會不平等的致因，持這種態度者，也不會肯定推動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必要性。對於社會正義價值的詮釋，對於有沒有存在族群間社會不正義的判斷，攸關著支不支持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

本文主要檢視基於法令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實務架構的內涵與特性，依筆者的分析判斷，其與主流社會工作共同的實務架構，在專業目標、手段和倫理價值的內涵上，相較而言並無實質的差異。換言之，當前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並非針對縮短原漢生活差距之目標的規劃。這樣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其功能與發展必然會受到相當明顯的侷限。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要與主流社會工作有明顯的功能區隔，必須奠基在多元文化

公民社會正義的釐清上。要縮短原漢間基本生活需求滿足的差距，就要重視基本生活需求滿足差距的衡量，重視其歷史上的成因及衍生的現實結構因素，才能研發有效的因應方案。這樣的發展歷程，必須始自文化福利權的釐清、認定、合法化和賦予權利，才能有效開展。

全國性的社會工作專業團體，應是最需伸出友善關懷支持之手的夥伴，這種研究發展改進的過程，必然是艱辛的，需要結合更廣大的力量的。我始終相信現代公民社會體制下的社會工作者，遲早會重新詮釋社會正義，會協助開創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環境條件，多元文化社會工作終而會被認真對待的。

（本文作者為玄奘大學社工系客座教授）

關鍵詞：實務架構（Practice Framework）、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ing）、原住民族社會工作（Indigenous Social Work）

📖 參考文獻

-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2005）。〈原住民的貧窮與匱乏〉，《新使者雜誌》87頁。
- 哈瑞爾·羅杰斯著，劉杰譯（2012）。《美國的貧困與反貧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郭俊巖、賴秦瑩（2019）。〈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的專業功能：一個實務上的觀察〉，《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9（1）。頁165-180。
- Ciwang Teyra（2016）。〈實踐狩獵文化—太魯閣族歷史創傷療癒〉，《法扶》51。頁15-19。
- Barker,R.L., (2003). 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 Bartlett, H. (1970). *The Common Bas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c.
- Blakely, Thomas J. and Dziadosz, Gregory M. (2007). Social Functioning: A Sociological Common Bas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34(4), Article 8.
- BOEHM, W. (1958).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3(2), 10-18. www.jstor.org/stable/23707527.
- Connolly, M., (2007). Practice Frameworks: Conceptual Maps to Guide Interventions in Child Welfa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7(5), 825-837.
- Hollis, F. (1972). *Casework: a psychosocial therap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heafor, B. W., Horejsi, C. R., & Horejsi, G. A. (1994). *Techniques and guideline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Towle, C. (1965), *Common Human Needs*. N.Y.: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c.